

半世文人半世僧

蒋心海 著

李叔同

李叔同，别号漱筒；祖籍浙江平湖，生于天津。中国
在书法、绘画和戏剧方面，都颇有造诣。从日本留学归国
后剃度为僧，法名演音，号弘一，晚号晚晴老人。

齊
魯
書
社

李叔同

半世文人半世僧

蒋心海 著

齊魯書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半世文人半世僧——李叔同 / 蒋心海著. —济南:
齐鲁书社, 2012.1

ISBN 978-7-5333-2564-0

I. ①半… II. ①蒋… III. ①李叔同 (1880~1942)
—生平事迹 IV. ①B949.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266710号

半世文人半世僧——李叔同

蒋心海 著

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
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189号
邮 编 250002
网 址 <http://www.qlss.com.cn>
电子邮箱 qlss@sdpress.com.cn
印 刷 肥城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mm×1000mm 1/16
印 张 14.625
字 数 218千
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33-2564-0
定 价 28.00元

小 引

1880年10月23日（清光绪六年，农历九月二十日），李叔同降生于天津城一户富商家里。

天津地处华北平原东北部，东临渤海，北枕燕山，位于海河流域下游，南运河、北运河、子牙河、大清河、永定河五大河在天津市区及其附近汇合而成海河，东流七十多公里至大沽口入海，故天津素有“九河下梢”“河海要冲”之称。

明朝时，燕王朱棣起兵争夺帝位，在此渡河南下。后来朱棣做了皇帝，为纪念这次起兵，将此地赐名为天津，意为“天子渡河之地”，并在此屯兵筑城，始称天津卫，“卫”即驻兵之所。

天津内有海河外临渤海，河海相连，是船舶往来必经之地。另据史载，早自唐朝就在此开辟盐场，设置盐仓。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渔盐资源，自然吸引着各地商贾汇集津门。清朝初年，有人就对天津做过如下描述：“海去城百里，从无人寇之患，商出百万之课，民获兴贩之利，乃鱼盐之藪也。”^{〔1〕}尤其是1684年清政府全面解除海禁之后，天津更是万商云集，商贸繁盛。

1860年，英、法联军占领天津，天津被迫开放，列强先后在此设置租界，发展洋行，染指海关，传播“洋教”。自此开始，反抗侵略的斗争在这里上演，中西文化的冲撞和融汇在这里激荡。几乎同时，洋务运动也鸣锣开场。1862年，驻守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，就在这里雇用英国军官训练天津洋枪队。1867年，崇厚又在这里设立军火机器局。而后，身兼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常驻天津，在此开办煤矿，兴办洋务教育。就在李叔同出生的这年九月，李鸿章还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，在津沪之间架起了电报线。此时的天津，

已成为北方繁华的商业中心、贸易港口和洋务运动的重镇，近代中国的历史风云，在这座城市的上空翻腾变幻。

李叔同生逢这样一个“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的时代，生长在这样一个繁华与贫困共生共存，传统与现代冲突抵牾，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城市里，他的人生将怎样开始，他的心路将趋向何方呢？

注释：

[1] 庞玉洁：《开埠通商与近代天津商人》，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。

目 录

contents / 1

小引 / 1

一、津门岁月 / 1

- 1 家世 / 1
- 2 童年印象 / 4
- 3 书生少年 / 6
- 4 京津艺友 / 9

二、海上风流 / 17

- 1 南迁 / 17
- 2 城南草堂 / 18
- 3 悲欢家国事 / 23
- 4 南洋公学 / 25
- 5 声色场上 / 29
- 6 沪学会 / 34

三、负笈东瀛 / 40

- 1 音乐小杂志 / 40
- 2 随鸥吟社 / 46
- 3 东京美术学校 / 49
- 4 春柳社 / 53

四、艺术人生 / 60

- 1 北归故里 / 60
- 2 太平洋画报 / 64
- 3 执教生涯 / 70
- 4 湖光山色伴歌声 / 85

目 录

contents / 2

五、走向空门 / 90

- 1 断食 / 90
- 2 皈依 / 97
- 3 披剃为僧 / 100
- 4 出家之谜 / 105

六、佛门修行 / 115

- 1 持戒修习 / 115
- 2 闭关永嘉 / 122
- 3 云游弘法 / 127

七、出世精神 / 136

- 1 前尘故旧 / 136
- 2 护生画集 / 148
- 3 晚晴山房 / 155
- 4 清凉歌集 / 161

八、人间晚景 / 164

- 1 行脚浙东 / 164
- 2 南闽梦影 / 171
- 3 最后忏悔 / 184
- 4 黄花晚节 / 193
- 5 悲欣交集 / 205

参考文献 / 218

后 记 / 220

津门岁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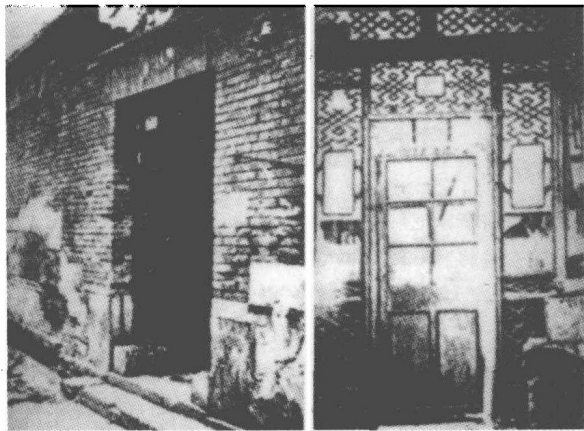
1 家世

天津老三岔河口，是南北运河与海河交汇之处，水陆交通便利，这里曾是天津最早的居民点，也是最早的水旱码头和商品集散地。在李叔同出生的年代，这里依然是漕运的中转站和长芦盐的集散地。直到1918年，海河裁弯取直，河口向西北挪移，老三岔河口和原北运河河床被填平，改造成了东河沿大街（现在的狮子林大街），三岔河口地区逐渐失去了往日的繁华。

在当年依旧繁华的老三岔口东侧，有条叫粮店后街的南北走向的马路。马路东侧，有条叫陆家胡同的东西向小街，胡同东口2号，是一所坐北面南的三合院，这里便是李叔同出生的地方。

当初，宅院的门楼不算太大，门楼正面有4扇平门，正对着北房。4扇平门很少打开，家人平常出入，只走门楼东侧的便门。院内方砖铺地，北、东、西三面，各有3间青砖房，墙基磨石抱角，房上有一米多高的女儿墙。在北房的后面，还有一个不大的院落，院内有灰土房3间，靠西房外首有一株老梅树。宅后不远处便是原北运河河身，顺河往东有条金钟河，沿河是一片树林。从李家住宅的情形来看，在当时的天津城里，也算得上殷实富足的家庭了。

李叔同祖籍浙江平湖，^[1]父亲名世珍，字筱楼（一作小楼、晓楼），祖父李锐，叔祖父李锜。据说李家祖辈经营盐业，康乾年间，天津漕运和盐业已相当兴盛，吸引了大量闽、徽、浙等地的商人来此经商，李家大约就是在这个时期来到天津。到李叔同父亲李筱楼这一辈，李家经过至少两代人的经营，盐业和钱庄业已颇具规模。



位于天津市河北区的两处“李叔同故居”

李叔同的父亲筱楼公53岁这年（清同治四年，公元1865年）考中进士，曾担任过吏部主事一职。或许是无心仕宦，或许是官场失意，不几年筱楼公就辞去官职，一心操持家中的生意了。进士出身的筱楼公，既有为官的背景，又有雄厚的资财，生意

越发红火，他先后买下大量的盐田引地，钱庄的规模也扩大了很多。据李叔同的次子李端回忆说：“我家曾多次来过‘镖’，这应该是我家干盐务的收入，通过镖行从引地押运到津的。”“来‘镖’的时候，前门打开，成箱的财物卸在前边的柜房里，人出人进，热闹极了。”^[2]钱庄的生意也做得很大，官北大街有专做门市生意的桐兴茂钱铺，家里还有做内局生意的桐达钱铺。桐达钱铺“柜房门廊柱上，有木制的抱柱对联，红底黑字，上下联的第一字分别是‘桐’、‘达’两字”^[3]。因此，人称李筱楼家为“桐达李家”，以便与冰窖胡同的另一户李姓富人区别开来。由此看来，这一时期的李家，已是津门有名的巨富之一了。

李筱楼前后至少有妻妾4人，原配姜氏生子文锦。李文锦长李叔同近50岁，娶妻后不几年就去世了。^[4]筱楼公又纳郭氏，未有生育；再纳张氏，生子文熙（1868—1929），字桐冈，长李叔同12岁。但李文熙自小身体羸弱，筱楼公担心其寿命不长，就在67岁高龄，纳18岁的王氏为侧室。第二年（1880）王氏生下李叔同，幼名成蹊，学名文涛，字叔同。

李叔同对生母王氏的感情很深，许多年后，当他与人谈起母亲时，还是痛苦地一皱眉，摇着头说：“我的母亲——生母很苦。”关于王氏夫人的情况，专门研究平湖方志的陈宰先生有过详细的考证，^[5]对其姓名、出生地、家世、嫁与李筱楼的过程讲得尤为详细具体，只是目前尚无与之相关的资料来印证。据说，王夫人出生在浙江平湖一小业主家里，与筱楼公

祖上是同乡，后来王家破产，只好将女儿远嫁天津，给年长自己近 50 岁的筱楼公做了侧室。

李叔同两岁的时候，筱楼公又在老宅附近的山西会馆斜对过，购置了一所大宅院（今粮店后街 60 号），全家搬过来居住。此宅院为道光年间一家富户所建，呈“田”字格局，由 4 个小院组成，分前后两个大院，除各有十多间正房和厢房外，还有厅房、仓房、过厅、游廊等。在“田”字当中一横的地方，有条两间房宽的间道，在“田”字中心紧靠间道的位置，有间高台阶的洋书房，是间刀把状的西屋书房，瓦顶有流水沟，东、南两面有窗。窗为两层玻璃，一层窗纱。房内有中式木床和书橱，摆设十分讲究。洋书房台阶下面，有竹篱围成的小花园，名为“意园”。在中国传统的大宅院里，弄一点洋书房之类的西式建筑，是当时大户人家的时尚，大概是为了显示主人的阔气和文明。在天津这样一个中西文化交汇的开放城市里，这也算是一道别致的风景了。

整座宅院沿街而建，坐西面东，大门为“虎座”门楼，门楣上有精致的百兽图镂空砖雕，迎面为刻砖照壁；门楼左侧为厅房，门楼和过道正上方分别悬挂着“进士第”和“文元”两方匾额。此时的李家宅第，宽敞而气派，彰显着主家的富贵与名望。这大概就是李家鼎盛时期的景象了。

1884 年 9 月，筱楼公患了痢疾，病势越来越重，多方延医诊治，却不见好转。筱楼公自知不起，索性不再延医问药，不意反倒有了痊愈的迹象。筱楼公笃信佛教，他从自身病情的异常变化中，觉察到自己的“舍报之日”也许就要到了，于是嘱咐家人延请高僧，于病榻之前诵念《金刚经》。他静静地聆听着和缓悠远的梵音，如入禅定，最后安详而逝，卒年 72 岁。

筱楼公去世后，在家停灵 7 天，每日请僧人一班或三班，诵经不绝。筱楼公进士出身，且做过吏部主事，又是津门巨富，因此丧礼的场面十分气派。时任直隶总督和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的李鸿章亲自“点主”，武官马三元“报门”，更是让李家倍具哀荣。

筱楼公去世以后，17 岁的李文熙执掌了家业。李家随着时局的动荡，在内忧外患中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败落。1898 年“戊戌变法”失败，国内政局陷入混乱，同时随着列强对中国侵略的不断加深，“反洋教”的运动也愈演愈烈。1900 年，“庚子国变”爆发，义和团运动扩展到京津地区，在

这种内外交加的动乱与战争中，京津一带的商业经营自然难逃此劫，而李家的盐业和钱庄也不可能不被殃及。1902年，李文熙被迫转让了自家在河南内黄县的盐业引地（官府指定给盐商从事运销食盐的专卖区），李家从此失去了盐商资格。3年后，李家在天津城内的钱庄之一“桐华钱铺”歇业。到了1911年，也就是李叔同留学归来的那一年，包括“桐达钱铺”在内的两家钱庄倒闭，百万家资荡然无存，李家从此彻底地败落了。

2 童年印象

筱楼公年届古稀，喜得幼子，其欢喜之情自不待言；尤其是在长子早逝，次子多病的情况下，天遂人愿又得一子，更是值得庆幸的一件喜事了。筱楼公性喜放生，据说李叔同降生那天，“捕者以鱼虾踵门求卖放生，聚绕若会，状极拥挤，鱼盆之水，溢于外者，几汇流成渠矣，公则尽数买而放之。又放鸟亦甚多。自后每逢师（李叔同）生辰，必大举放生如故”^[6]。这样的慈善之举，不仅包含了对生命的珍视，更包含着筱楼公对爱子的福佑。

家庭的富有，父母的疼爱，使李叔同的孩提时代衣食无忧，充满温馨和欢乐。多年以后，任教浙江第一师范的李叔同，写下一首《忆儿时》的歌曲，不无深情地回忆了那段短暂而美好的幼年时光。歌中写道：

春来秋去，岁月如流，游子伤漂泊。回忆儿时，家居嬉戏，光景宛如昨。茅屋三椽，老梅一树，树底迷藏捉。高枝啼鸟，小川游鱼，曾把闲情托。儿时欢乐，斯乐不可作。儿时欢乐，斯乐不可作。^[7]

“茅屋三椽”大概是诗化了的意象，与李叔同的居住情景并不相符，但歌中所述嬉戏的快乐想必是真实的吧。

在李叔同的童年记忆里，有许多事情是和佛事相关的。当时的天津，寺庙星罗棋布。据记载，在同治年间，天津竟有三百多座寺庙分布在城垣内外。李叔同的父亲信佛，在家里还设有佛堂。父亲临死时，还嘱咐家人延请高僧前来念佛诵经。那时李叔同只有5岁，对和尚放焰口之类的法事，懵懂而好奇，甚至还有几分向往，他用心记下每一个关节，多年后，还和侄儿圣章等玩和尚念经的游戏。他们把夹被或床罩披在身上当袈裟，叔同扮“大帽”和尚，端坐在炕上，双手合十，口中念念有词，侄儿在下首扮

小和尚，随时听从调遣。

李叔同家门前的胡同口，有一座叫“地藏庵”的菩萨庙，王妈妈（保姆）时常带着他去看和尚做功课。叔同的郭姓妈妈和早寡的大嫂也常带他到庙里念佛。他还有一个寡居的大侄媳，也心向佛门，常到附近的无量庵学念《大悲咒》和《往生咒》，还不到6岁的叔同觉得有趣，就经常跟了去，站在一旁听她们念经，不用多久，就能朗朗成诵了。诸如此类的佛事活动，对幼小的叔同来说，或许不无游戏的成分，然而叔同是敏慧过人的孩子，这些似懂非懂的梵音佛语，想必也会在他稚嫩的心灵上，留下难以抹去的印痕。

叔同的父亲筱楼公，“晚年乐善好施，设义塾，创备济社，范围甚广，用人极多，专事抚恤贫寒孤寡，施舍衣食棺木。每届秋末冬初，遣人至各乡村，向贫苦之家探察情形，并计人口之多寡，酌施衣食。先给票据，至岁暮，凭票支付。又设存育所，每届冬季，收养乞丐，不使冻馁，诸如此类，不一而足。年斥资千万计，而不少吝惜，津人咸颂之曰‘李善人’”^[8]。尽管叔同年幼懵懂，但对人世间贫病生死的种种悲苦，想必会有所见闻；而父亲扶危济困的善举，也自然会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叔同出家的第二年，胡宅梵曾问起他的童年事迹。叔同说：“年幼无知，事不足言。唯我父乐善好施之行，颇堪风世励俗，差足传述，而与余幼年之生活，亦有密切之关系也。”^[9]人性的养成，或许与幼年时期的生长环境不无关系，叔同生长在这样一个崇佛的家庭之中，生长在这样一个拥有慈悲心肠的父亲身边，庭训之外，耳濡目染，潜移默化，他的内心自然会变得柔软而温暖，悯世的情怀和博爱群生的精神也在他的心灵深处潜滋暗长。

筱楼公除了信奉佛教之外，还尊崇理学，“饮食起居，悉以《论语·乡党》篇为则，不少违”^[10]。“乡党篇”主要记述孔子平素的举止言谈、衣食住行和生活习惯。筱楼公进士出身，是正宗的读书人，对这位“至圣先师”的言行倍加崇尚，极力仿效，不敢有一丝一毫的违拗。这种近乎刻板的行事风格，久而久之就成了家庭的规矩。“乡党篇”中有“不撤姜食，不多食”一句，意思是每餐都要吃点姜，但也不要多吃。叔同也学着父亲生前的样子，每当吃饭的时候，总要在饭桌上摆一碟姜。有一次用餐时，饭桌摆放得不正，母亲就训导叔同说“席不正不坐”。这些行事的规矩，或许过于苛严了，然



1896年李叔同在天津留影

而对叔同来说，似乎并非是不可忍受的约束。成年后的叔同，凡事认真，律己至严，这一性格的养成，也许与诸如此类的事情有关吧。

自父亲死后，叔同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，似乎也有了微妙的变化。在这个大家族里，母亲的地位其实只是一个小妾。随着一家之主的离世，家族内的诸多事情更趋复杂，母子俩的生活陷入尴尬的氛围之中。叔同虽小，但母亲的不舒心他是能感觉得到的。叔同的乳母，能读《明贤集》，闲暇时，就教叔同背诵里面的诗句：“高头白马万两金，不是亲来强求亲。一朝马死黄金尽，亲者如同陌路人。”从这样的诗句里，叔同读出了人情的冷暖，世态的炎凉。他曾写下过这样的诗句：“人生犹如西山月，富贵终如瓦上霜。”幼小的心灵里竟生起人生苦空无常的感觉。

复杂而微妙的生存处境，使叔同越发敏感起来，他冷眼看取周围的一切，对一些不平之事，总是心中愤愤。他不喜欢那些道貌岸然的老道学，看不惯那些在上骄、在下谄的人。二哥文熙待他还是不错的，但他对二哥待人接物上，看人下菜碟的作风，十分反感，常反其道而行之，“遇贫贱者敬之，富贵者轻之”^[11]。他甚至觉得那些势利和伪善的人，还不如猫狗来得真实和可爱。他蓄养了一大群猫，一有闲暇就和它们厮混在一起，而他的不平之心，也越来越偏于激烈，常常是敬猫如敬人，见人反而不致敬。有人说他疯疯癫癫，他也毫不在乎，直到十多年后他在东京留学时，仍未改其奇特的个性。有一次，他忽然从日本发来一封电报，询问他蓄养的那些猫是否平安。

这些酸甜苦辣的人生经历，给幼年时的叔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也不可避免地给他的心灵成长和人格养成带来长久的影响。

3 书生少年

李叔同六七岁时，在二哥李文熙的指导下接受启蒙教育。文熙年长叔

同12岁，秀才出身，对叔同的教督十分严格，叔同的一举一动都不能稍越规矩。文熙每天为叔同授课，并时常指点他诵读《玉历钞传》《百孝图》《返性篇》《格言联句》《文选》等。叔同天生颖悟，往往一遍读罢，就能琅琅成诵。八九岁时，叔同又随塾师常云庄先生学习“正规”的课程。头两年读《孝经》《毛诗》《唐诗》《千家诗》，接着读《四书》《古文观止》。十二三岁，习训诂之学，读《尔雅》《说文解字》，并开始临摹篆帖。十四五岁，又研读了《左传》等史籍。几年的家馆课业，使叔同在经史诗文和文字学等方面打下了扎实的根底。

16岁这年（1895），叔同考入辅仁书院学习制义（八股文），这是当时学子们博取功名的必修课。叔同生长在“诗书传家”的封建门第里，未尝没有以仕途功名光耀门楣的想法，这是那个时代的读书人的人生正途，更是他深爱着的母亲的殷殷期望。

辅仁书院在天津城西北文昌宫旁边。当时的书院以考课为主，不再讲学。为督促学生学习，书院每月安排两次考课，一次为官课，一次为师课，分别由官方和掌教出题、阅卷、评定等级，成绩优异者发给奖赏银钱。入书院之前，叔同已饱览经史诗文，学有根底，再加上他聪颖好学，每次考课文章，总能文思涌动，下笔千言。按照试卷的格式，文章的书写要一格一字，而叔同每每觉得纸短文长，言犹不尽，便在一格内改书两字。此举一时传为美谈，叔同也被同学戏称为“李双行”。他的文章时常名列前茅，获得奖银。

平心而论，此时的叔同，对于仕进之路还是心怀期待的，也是充满信心的。当时，学子中流传着一份《临别赠言》。这是山西浑源县“恒麓书院”教谕思齐先生，在1892年离开书院时，留给门下诸生的临别之言。有人遵照赠言的指点，勤读苦修，竟然连掇巍科。于是，浑源士人，群起效仿，纷纷将“赠言”放置案头，奉为圭臬。叔同得到这份《临别赠言》之后，亲手将



1900年时的李叔同

其抄录下来。文曰：

读书之士，立品为先。养品之法，惟终身手不释卷。……况善书之士，大之可以掇词科，小之可以夺优拔，要皆仕进之阶。有志者诚不可以忽也。（后学李成蹊摹）^[12]

叔同以此作为自己读书、行事的准则，虽然未曾因此而走上仕进之途，但思齐先生的读书、立品之道，为文、为书之论，无疑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他后来对“人品”与“器识”的推重，对书法艺术的终身不弃，恐怕与此不无关系。

当此之时，洋务运动也不断向纵深推进，赓续千年的教育模式面临瓦解。就在叔同入读辅仁书院的这一年，直隶总督王文韶上奏光绪皇帝，要求开办西学学堂。同年，以美国学制为模式的“北洋西学学堂”成立，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新式学堂。次年，北洋西学学堂正式更名为“北洋大学堂”（今天津大学前身）。此风一开，天津的一些书院纷纷仿效，陆续改制为新式学堂。为增加洋务书院的经费，旧式书院的大量经费被削减。面对这种局面，叔同的感受颇为复杂，他在给自家账房先生徐耀廷的信中这样写道：

……今有信（消息）将各书院奖赏银皆减去七成，归于洋务书院。照此情形，文章虽好，亦不足以制胜也。昨朱莲溪兄来舍，言有切时事，作诗一首云：“天子重红毛，洋文教尔曹。万般皆上品，唯有读书糟。”此四句诗，可发一笑。弟拟过五月节以后，邀张墨林兄内侄杨君，教弟念算术，学洋文。^[13]

正可谓世事难料，当少年叔同在辅仁书院里挥洒文章，准备一展宏图的时候，以科举应试为教育目标的旧式书院，却不期而然地受到了冷落。对此，叔同的内心有些无奈，抑或有些失落，但他毕竟是生活在中西文化交汇的开放城市里，这样的环境给了他接受外来文化和新鲜事物的胸怀，他欣然面对时势的变迁，毫不犹豫地念起了算术，学起了洋文。

1896年，17岁的李叔同离开了寄托着他最初人生愿景的辅仁书院，在学习算术、洋文的同时，入二嫂娘家的姚氏家馆。姚家也是当时天津的盐商富户。在姚氏家馆，叔同师从津门名士赵元礼，学习诗词文章。赵元礼（1868—1939），字体仁，又字幼梅，号藏斋，天津人。他曾先后从学

多位硕儒名师，熟读经史典籍，也读了大量诗赋时文。著有《藏斋诗集》13卷，以及《藏斋诗话》《藏斋随笔》等，是一位诗文书法皆善的饱学之士。叔同先跟从赵元礼学习辞赋时文（八股），后学作诗填词。赵元礼推重苏东坡，故以苏诗相授，兼及晚唐诗，再“由晚唐人北宋”。叔同一向喜欢唐、五代诗词，尤爱王维诗和苏东坡、辛弃疾词。东坡好以禅语入诗，又多豪放清雅之句，这对叔同诗词风格影响尤深。

书生少年，意气风发，叔同就像一株茁壮的禾苗，旧学新知，兼收并取，拼命地吸纳着各种养分，洋文算术、古典诗词之外，他还师从唐静岩学习篆隶及刻石。唐静岩先生原籍浙江，久居天津，以行医为业。唐静岩在书法上主张从秦汉六朝入手，摒弃“纸粉气”“甜俗气”，其“篆刻深稳，有秦汉风度，尤以转折处有《天发神讖》意”^[14]。叔同从唐先生学书法，自然取径高远。为使学有所本，博采众长，李叔同遍临名家碑帖。对唐先生的书法，叔同似乎更为偏爱。为得到老师的一套范本，他精心准备了24张册页，请先生为他分别临写钟鼎、篆隶、八分各体书法，并将其结集成册，郑重地在封面上题签《唐静岩司马真迹》，下署“当湖李成蹊署”，册后钤上自刻的“叔同过目”篆字印章。唐先生则写一跋语，记述此事的来龙去脉：

李子叔同，好古主也，尤偏爱拙等。因出素册念四帧，嘱书钟鼎篆隶八分书，以作规模。情意殷殷，坚不容辞。余年来老病频增，精神渐减；加以酬应无暇，以致笔墨久荒。重以台命，遂偷闲为临一二帧，积日既久，始获葺事。涂鴉之消，不免貽笑方家耳。^[15]

后来，叔同还出资将其刊印，以方便平日临摹欣赏，并分赠友朋同好。

叔同少年时期的书法作品存世不多，但从仅见的几幅习作来看，笔力俊健，颇见功力，已初显少年书家的才华。

4 京津艺友

就个人才性与爱好而言，李叔同更倾心的是诗词、金石书画和戏剧之类的艺事。早在师从赵元礼、唐静岩之前，叔同对金石书画就有着浓厚的兴趣，显示出非同一般的天赋，而且他投入了大量的精力，他曾自言“年

十三，辄以书法、篆刻名于乡”^[16]。书法是世代学子的必修课业，是科考成败的重要条件，而篆刻则是学习训诂之学的方便门径。晚清金石之学盛行，在文人名士中，品藏碑版，捉刀治印，便自然成了一种时尚。

在修习金石书画的过程中，对李叔同帮助最多的，当属李家账房先生徐耀廷。徐家与李家是近邻。徐耀廷长兄系天津著名画家，受其影响，徐耀廷亦擅长书画篆刻，且小有名气。徐耀廷李比叔同大23岁，叔同尊他为“五哥”“老哥”“徐五爷”，二人朝夕相处，感情甚笃，无话不说。1895年，叔同画了一幅“八破”扇面，上面画有旧书、旧报纸、旧信封等8件旧物。画中旧信封上写着“内有要件祈带至天津河东山西会馆桐兴茂面交徐五老哥耀廷开启”字样。从这些不无游戏色彩的丹青笔墨中，可以想见二人关系的融洽与亲密。

从有限的文献资料来看，李叔同至迟十一二岁，就在徐耀廷的帮助和指点下学习金石书画。从现存二人的信件及作品中，可以看出李叔同向徐耀廷切磋请益的情景，也反映出叔同对金石书画的热衷以及所下的工夫。1896年夏天，徐耀廷为李家业务上的事远去张家口。在几个月的时间里，叔同写给耀廷的信就有17封之多。信中除了告诉一些家中琐事、熟人近况、社会见闻和气候变化之外，谈得最多的还是金石书画方面的事情。在1896年旧历五月十五日的信中，叔同写道：“柴少文送弟鸡心红图章一个，有此大小（信上画有图样），刻‘饮虹楼’三字。皆是灰地，而亦属不错。”“弟昨又刻图章数块，外纸一片上印着，谨呈台阅，祈指正是盼。再有弟近日镌得篆书隶书仿二篇，并呈台阅，亦祈指正是盼。”七月十五日信：“阁下在东口，有图章即买数十块。如无有，俟回津时路过京都，祈买亦可。愈多愈好。并祈在京都买铁笔数枝。并有好篆隶帖，亦祈捎来数十部。价昂无碍，千万别忘了！”八月初五信中又说：“如来时，路过都门，千万与弟捎铁笔数枝、古帖数部、图章数块。要紧要紧，别忘别忘，非此不可。弟昨又镌图章数块，印在纸上，呈览，祈晒政为要。”^[17]在与徐耀廷亦师亦友的交往中，李叔同书法篆刻的技艺也在与日俱进。

两年后，李叔同移居上海，依然将徐耀廷视为问道与求助的师友。1899年秋，叔同致信徐耀廷说：“今冬仍拟出《瓦砚题辞》一书，印成当再奉鉴。印谱之事，工程繁琐，今年想又不能凑成矣。然至迟约在明春，